

情节冲突背后隐藏的冲突： 卡夫卡《判决》中的双重叙事运动

申 丹

内容提要 卡夫卡的《判决》是世界名篇，也是最令人困惑难解的作品之一。一个世纪以来，它吸引了大量注意力，引发了激烈的批评争议。受长期批评传统的影响，中外学界仅仅关注了《判决》的情节冲突。倘若我们打破传统的束缚，把视野拓展到其情节背后的另一种叙事运动，就可看到一种不同性质的冲突。作品的意义在于这两种叙事运动的交互作用，在于这两种冲突的相互矛盾、相互制约和相互补充。如果能看到这一点，就能更好地理解《判决》在卡夫卡创作中的重要突破，更好地把握为何《判决》是理解西方现代派文学的一把关键钥匙。

关键词 《判决》 隐藏的冲突 双重叙事运动

弗兰兹·卡夫卡的短篇小说《判决》（1912）不仅是“理解卡夫卡主要成就的关键（a key）”^①，而且对于理解“20 世纪文学的敏感性”^② 也至关重要。西方批评界十分青睐这一作品，至上世纪 80 年代，公开发表的专论已近 200 篇^③；国内也有不少学者对其加以关注，但相关的专论较少。作品的情节线索较为简单：年轻商人格奥尔格·本德曼在自己的房间里给在俄国经商的朋友写了封信，告知自己订婚的消息。接着他带着这封信去找父亲。父亲的反应令人诧异，开始说不

① Russell A. Berman, “Tradition and Betrayal in ‘Das Urteil’”, in James Rolleston, ed., *A Companion to the Works of Franz Kafka*, New York: Camden House, 2002, p. 85. 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首词及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② See Walter H. Sokel, “Kafka and Modernism”, in Richard T. Gray, ed., *Approaches to Teaching Kafka's Short Fiction*, New York: MLA, 1995, pp. 23–34.

③ See Stanley Corngold, *Franz Kafka: The Necessity of For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24.

相信儿子有这位朋友，后来又说自己一直在跟这位朋友联系。他指责儿子欺骗这位朋友，缺乏人性，最后判决儿子投河淹死，而儿子果真冲出家门去投河自尽。一个世纪以来，批评家们采用了各种方法阐释这一文本，尽管角度各异，阐释结果也难以调和，但达成了一种共识：《判决》的情节发展围绕父子冲突展开。一种有代表性的阐释是根据卡夫卡的书信和日记将父亲视为暴君：“《判决》中父子的冲突居于故事的中心。父亲对儿子的判决，是儿子长期畏惧父亲那‘暴君式’的统治而又始终不能战胜父亲‘强大阴影’的必然结果。换句话说，这样的父子关系对儿子来说只有死路一条。”^①也有不少学者将儿子视为负面人物，认为他“所看到的只是非现实的世界”，读者跟随儿子的视角“经历了噩梦，经历了父亲对儿子幻想世界的挑战”，最后儿子的“世界土崩瓦解”；他“由于自我中心主义被他父亲判处了死刑”，“父亲对他的判决是他罪有应得”^②（see also “Tradition”：85-100）。

然而，倘若我们打破长期批评传统的束缚，在关注情节发展的同时，把眼光拓展到其背后的另一种叙事运动，即笔者称之为“隐性进程”的叙事暗流^③，则能发现贯穿文本始终的另一种冲突：个人与社会的冲突。在这一冲突中，儿子、父亲以及其他人物均成为社会压力的牺牲品。卡夫卡通过叙事暗流里的这种冲突，既微妙又强化地勾勒出现代西方社会中个体在社会压力下的异化，使作品暗暗成为现代西方人生存困境的一个缩影，并使《判决》与卡夫卡随后创作的《变形记》、《诉讼》等形成呼应，共同抗议现代西方社会对个体心灵的扭曲。在《判决》里，隐性进程和情节发展的冲突并列前行，两者相互矛盾、相互排斥、相互制约又相互补充，在张力中联手表达出作品丰富的主题意义，塑造出多面的人物形象。

一、关于朋友的思考中的双重叙事运动

故事的开头段落从全知叙述者的角度进行描述，寥寥几行文字交代了故事时间（春天的周日上午）、写信地点（格奥尔格的房间）、事情起因（给朋友写了

① 叶廷芳《卡夫卡及其他》，同济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8页。

② 详见曾艳兵《卡夫卡研究》，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195-2003页。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的首字及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③ 详见申丹《何为叙事的隐性进程？如何发现这股叙事暗流？》，载《外国文学研究》2013年第5期，第47-53页；see also Dan Shen, “Covert Progression behind Plot Development: Katherine Mansfield’s ‘The Fly’”, in *Poetics Today* 34.1 (2013), pp. 147-175; see also Dan Shen, *Style and Rhetoric of Short Narrative Fiction: Covert Progressions Behind Overt Plots*,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14.

封信)。格奥尔格把信装进信封后,看着窗外的景色,陷入了沉思。从第二段开始,作者把读者带入格奥尔格的内心世界,直接展现他的思维活动。这一思考几乎占去了作品三分之一的篇幅,但却基本未涉及格奥尔格与父亲的关系,而是聚焦于那位朋友及其与格奥尔格的关系,其中一段文字如下:

他就这样在国外徒劳无益地苦心经营着……他的皮肤蜡黄,看来好像得了什么病,而且病情正在发展。据他自己说,他从来不和那儿的本国侨民来往,同俄国人的家庭也几乎没有什么社交联系,并且准备独身一辈子了……或许应该劝他回国,在家乡定居,恢复同所有旧日友好的关系——这不会有什么障碍的——此外还要信赖朋友们的帮助?但是这样做不就等于告诉他,他迄今为止的努力都已经成为泡影,他最终必须放弃这一切努力,回到故乡,让人们瞪大眼睛瞧他这个回头的浪子;这不就等于告诉他,只有他的朋友才明白事理,而他只是个大孩子,必须听从那些留在国内并已经取得成就的朋友的话去行事。这话说得越委婉,就越会伤害他。更何况使他蒙受这一切痛苦烦恼,是否就一定有什么意义呢?也许,要他回国是根本不可能办到的——他自己说过,他已经不了解家乡的情况。这样的话,他将不顾一切地继续留在异乡客地,而朋友们的规劝又伤了他的心,使他和朋友们更加疏远一层。如果他真的听从了朋友的劝告回归祖国,而在国内又感到抑郁——当然不是大家有意为之,而是现实造成的——既不能和朋友相处,又不能没有他们,他会抱愧终日,而且当真觉得不再有自己的家乡和朋友了,那倒不如听凭他继续留在异国他乡。^①

由于情节围绕父子冲突展开,而这段沉思却聚焦于这位朋友,究竟起何作用成了一个难解之谜。卡夫卡曾经提到,这位朋友是“父子之间的联系”^②,也体现了“父子两人最大的共同点”^③。从情节结构来看,父子冲突因儿子给这位朋友的一封信而起,父亲对儿子的“判决”也跟朋友直接相关,因此这位朋友构成了父

① 弗兰兹·卡夫卡《判决》,孙坤荣译,收入叶廷芳主编《卡夫卡短篇小说选》,漓江出版社,2013年,第43-44页。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首字及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笔者仔细对照原文和译文,并根据任卫东教授和叶廷芳先生提出的修改意见,对译文略作了改动。

② Franz Kafka, *Letters to Felice*, trans. James Stern and Elisabeth Duckworth, New York: Schocken, 1973, p. 267.

③ Franz Kafka, *The Diaries of Franz Kafka, 1910 - 1913*, trans. Joseph Kresh, ed. Max Brod, New York: Schocken, 1954, p. 278.

子之间的结构纽带。^①然而,这依然难以说明,为何要用长达作品三分之一的篇幅来展示格奥尔格对这位朋友的思考。

约翰·怀特在针对这位朋友的专论中,首先总结了其他几位批评家的看法:其一,这位朋友是作品中“唯一奇怪的因素”,使作品“从一个简单的自然主义的故事转变成一个真正的卡夫卡式的谜团”;其二,这位朋友是“一个生动简练的艺术作品中的一个败笔”,他“无法变得活生生的”,也“无法表达卡夫卡希望他表达的意义”;其三,这位朋友是一个负面形象:“不在场、无姓名、未结婚、事业失败、身患疾病。”^②在此基础上,怀特指出了这位朋友与格奥尔格之间的种种差异:前者事业上的失利反衬出后者事业上的成功;前者的离群索居和孑然一身反衬出后者的朋友环绕和订婚之喜;前者对自己境遇的满腹牢骚反衬出后者对自己境遇的心满意足;前者的清心寡欲和注重精神反衬出后者的世俗肉欲^③(see “Georg”: 99-100)。

格奥尔格与这位朋友的差异是有目共睹的,但作者究竟想通过这些差异表达何意则众说纷纭。大多数学者认为格奥尔格旨在通过朋友的反衬,使自己更加自鸣得意;与其说是在为朋友考虑,倒不如说是为了自我欣赏。^④也有不少学者认为那位身处异国的朋友是格奥尔格个性中的另一面(alter ego):做生意的格奥尔格追求物质,而那位朋友则象征他身上追求精神和文学创作的一面,或者是他从前更加“纯真的自我”的投射^⑤(see “Georg”: 100-101)。从精神分析角度切入的另一种看法则认为那位朋友就是梦幻中的格奥尔格自己,朋友的失意是格奥尔格(的自我所不承认的)自身失意的一种伪装,朋友远走他国则代表了格奥尔格逃脱父亲阴影的愿望。^⑥也有学者认为那位在俄国的朋友“代表着格奥尔格性格中恋母的那一部分”;订婚之后,“格奥尔格性格中的两个部分已经发展到两个极端:一边是寻求自我社会化的部分,另一边是恋母的部分。在此过程中,

① See Kurt J. Fickert, “The ‘Doppelgänger’ Motif in Kafka’s ‘Blumfeld’”, in *Journal of Modern Literature*, 6.3 (1977), pp. 420-423.

② See John J. White, “Georg Bendemann’s Friend in Russia: Symbolic Correspondences”, in Angel Flores, ed., *The Problem of ‘The Judgment’: Eleven Approaches to Kafka’s Story*, New York: Gordian Press, 1977, pp. 98-99. 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首词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③ 怀特还关注了那位朋友与格奥尔格和格奥尔格父亲的其他关联(见本文第四节)。

④ See John M. Ellis, “Kafka: ‘Das Urteil’”, in *Narration in the German Novell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4, pp. 188-211.

⑤ 实际上那位朋友也在做生意,只是未做成功而已。

⑥ See Robert T. Levin, “The Familiar Friend: A Freudian Approach to Kafka’s ‘The Judgment’ (‘Das Urteil’)”, in *Literature and Psychology*, 27.4 (1977), pp. 164-173.

寻求自我社会化的部分不断压抑和排斥恋母的部分”^①。

由于批评界公认《判决》中的情节聚焦于父子冲突，而儿子关于朋友的思考却基本未涉及父亲，因此批评界集中关注这一思考对塑造儿子的形象所起的作用。然而，在父子冲突的情节背后，存在一个与之并行的“隐性叙事进程”，它转而聚焦于个人与外部世界的冲突。在这一叙事暗流中，格奥尔格关于朋友的思考暗中体现了他对自己与外部世界关系的看法，为作品展现他与外部世界的冲突作出了铺垫。在这一隐性进程中，重要的不是涉及朋友个人境遇的词语，而是涉及朋友社交圈的词语：

让人们瞪大眼睛瞧他这个回头的浪子；这不就等于告诉他，只有他的朋友才明白事理，而他只是个大孩子，必须听从那些留在国内并已经取得成就的朋友的话去行事。这话说得越委婉，就越会伤害他。更何况使他蒙受这一切痛苦烦恼……而朋友们的规劝又伤了他的心，使他和朋友们更加疏远一层。如果他真的听从了朋友的劝告回归祖国，而在国内又感到抑郁——当然不是大家有意为之，而是现实造成的——既不能和朋友相处，又不能没有他们，他会抱愧终日，而且当真觉得不再有自己的家乡和朋友了，那倒不如听凭他继续留在异国他乡。

这些文字对于情节发展无关紧要，甚或显得琐碎离题，但对于隐性进程却至关重要。在格奥尔格看来，朋友回国的主要障碍是国内社交圈的评价，是社会压力对自我的损害。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社会压力是朋友从未提及的，而仅仅是格奥尔格的主观推测。那位朋友跟格奥尔格十分相似，两人的友谊始于孩童时期，一起长大成人，现在都是年轻商人。从格奥尔格和他父亲居住的“构造简易的低矮的房屋”^②（《判》：43）来看，格奥尔格家的生意以前并不兴隆，跟朋友的境遇有某种相似之处，因此能够设身处地为朋友着想。格奥尔格对朋友的思考，反映出他自己的如下心理特征：其一，十分在乎周围人的看法，如果“既不能和朋友相处，又不能没有他们”，就会“抱愧终日”；而“一切痛苦烦恼”都源于朋友

① 任卫东《个体社会化努力的失败》，载《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第42页。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首字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② 有钱人的房屋在结构上往往各具特色，而在故事简短的开头，全知叙述者从自己的视角，特别描写了格奥尔格的“住所是沿河一长溜构造简易的低矮的房屋中的一座，这些房屋几乎只是在高度和颜色上有所区别”（《判》：43）。值得一提的是，与英法等国相对照，奥地利和德国一些传统城镇的房屋往往颜色鲜艳，且色彩和高度不一。

的爱护所无意中造成的社会压力。其二，从“朋友”与“家乡”、“祖国”的相提并论，我们可以看到周围的人代表了整个社会；如果不再能跟朋友相处，也就意味着不再有家乡和祖国。从这一角度，我们可以推断朋友在俄国离群索居的原因：为了躲避事业发展不顺所带来的社会压力，朋友既不和“本国侨民”来往，也不和“俄国人的家庭”来往。

如上所引，据这位朋友“自己说”，他不能回国是因为“他已经不了解家乡的情况”。但在格奥尔格的思考中，我们则看到：“他的解释完全是敷衍文章，说是俄国的政治局势不稳，容不得一个小商人离开，哪怕是短暂的几天都不行。然而，就在这段时间内，成百上千的俄国人却安闲地在世界各地旅行。”（《判》：44）朋友商场失意之后，“归国的次数越来越少”（《判》：43），这显然是因为愧对国内的亲朋好友，但他自己却不愿承认这一点。通过直接展示格奥尔格对朋友无法回国的思考，又将格奥尔格的解释与朋友的解释加以对照，作品以微妙的笔法，强调出格奥尔格对社会压力的关切和重视。

紧跟上面那段引文是格奥尔格的一句总结：“考虑到这些情况，怎能设想他回来后一定会前程似锦呢？”（《判》：44）通常，经商究竟是否能“前程似锦”取决于个人能力和资金、货源、商铺、客流等条件，但格奥尔格的思考则没有涉及这些内外在条件，他脑海里的“这些情况”直接指涉外人的看法或社会压力对自我的挤压和损害：“让人们瞪大眼睛瞧他这个回头的浪子……必须听从那些留在国内并已经取得成就的朋友的话去行事……愈加会伤害他的感情……使他蒙受这一切痛苦烦恼……在国内又感到抑郁……他会抱愧终日。”

这句总结之后，是格奥尔格的如下评论：“鉴于这些原因，如果还想要和他继续保持通信联系的话，就不能像对一个即便是最疏远的熟人那样毫无顾忌地把什么话都原原本本地告诉他。”（《判》：44）值得注意的是，此处的“这些原因”和上句中的“这些情况”所指完全相同，都涉及社会评价和社会压力可能对个人造成的伤害。我们在作品后面会看到，格奥尔格一直不敢在信里告诉朋友自己近几年商业上的成功。与其说这是怕“徒劳无益地苦心经营着”的朋友心生妒忌，倒不如说是为了不给朋友带去社会压力。格奥尔格的成功依然会让身处异国的朋友觉得只有“那些留在国内并已经取得成就的朋友”“才明白事理”。这种无形的社会压力依然会让他“感到痛苦烦恼”和“抱愧终日”。

众多批评家以卡夫卡的《致父亲》以及其他书信和日记为依据，认为《判决》的主题涉及儿子（卡夫卡本人）与暴君式父亲（卡夫卡的父亲）之间的冲

突关系。然而，若仔细考察卡夫卡的《致父亲》，我们同样也可看到卡夫卡对自己与外部世界之关系的关注：“我常想起我们常在一个更衣室里脱衣服的光景。我又瘦、又弱、又细，你又壮、又高、又宽。在更衣室里我已经自惭形秽，而且不仅是对你，而是对全世界，因为你在我眼里是衡量一切的标准……有时你自己先脱了衣服，我得以一个人留在更衣室里，尽可能拖延到公众面前去献丑的时间……你从来这样指责我（有时面对我一个人，有时当着其他人的面，你对后一种场面的侮辱性压力毫无感觉）。”^①此外，在《致父亲》里，我们可以看到暴君式的父亲给卡夫卡在别人面前带来了很强的负罪感，也导致他害怕别人：“当我同其他人相遇在一起时，我在他们面前会陷入更深的负罪意识之中……到头来，这种不信任变成了我对自己的不信任，变成了对其他所有人的永无止境的害怕。”^②在《判决》的情节发展中，我们看到的是父子之间的关系和冲突，在情节背后的隐性进程里，我们看到的则是个体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和冲突。

格奥尔格对朋友的思考还涉及了自己的未婚妻：

他常常和未婚妻谈起这位朋友，以及他们在通信中这种特殊的情形。“那么他不会来参加我们的婚礼了，”她说，“然而，我是有权利认识你所有的朋友的。”“我不想打扰他，”格奥尔格回答说，“不要误会我的意思，他可能会来的，至少我认为他要来的，但他会感到非常勉强，自尊心受到损害，也许他会嫉妒我，而且一定会不满意，可是又没有能力消除这种不满，于是只好孤独地再次出国。孤独——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是的，难道他不会通过另外的途径获悉我们结婚的消息吗？”“这个我当然不能阻止，但是由于他的生活方式，这是不太可能的。”“既然你有这样一些朋友（Freunde），格奥尔格，你就根本不应该订婚。”“是的，这是我们俩的过错，不过我现在不愿意再改变主意了。”她在他的亲吻下尽管气喘吁吁，却还说道：“这其实伤害了我。”（《判》：45-46。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通常，单身汉参加别人的婚礼，易心生嫉妒，然而，格奥尔格首先认为那位朋友参加自己的婚礼，“自尊心”“一定”会“受到损害”。这是因为在男大当婚的社

① 详见卡夫卡《致父亲》，收入叶廷芳主编《卡夫卡全集》（第7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407-419页，此处及下处引文中的着重号为笔者所加。

② 卡夫卡《致父亲》，第427-428页。

会里，到一定年纪的男子若无能力结婚，会受到或明或暗的社会压力。这位朋友事业不顺，因而独身。参加格奥尔格的婚礼，会让他对自己“感到不满意”，“可是又没有能力消除这种不满”——在国外发展不顺，又无法回国面对社会压力。

在这一片段里，我们还可看到对格奥尔格的第一个“判决”：“既然你有这样一些朋友，你就根本不应该订婚。”未婚妻这一“判决”的言下之意是：你不配做我的丈夫，我也不应成为你的妻子。其衡量标准并非格奥尔格的自身缺陷，也并非两人之间的不协调，而是格奥尔格朋友^①的行为。我们知道，西方的婚礼不仅是人生历程的重要里程碑，而且是极其重要的社交场合。新郎的朋友是否参加婚礼，体现出是否重视新郎和新娘；不参加婚礼会使新人丢失脸面。在未婚妻看来，以朋友为代表的社会评价高于一切，只要朋友不能来参加婚礼，结婚就是个错误。对于这一判断标准，格奥尔格加以认可（“是的，这是我们俩的过错”）。然而，此时格奥尔格的情欲占了上风，尽管他的亲吻也调动起了未婚妻的情欲（“气喘吁吁”），但社会评价依然压在她的心头（“却还说道：‘这其实伤害了我’”）。接下来是这么一段文字：

这时，他真的认为，如果把这一切写信告诉他的朋友，也不会有什么麻烦。“我就是这样的人，他必须接受。”他自言自语地说，“我无法从我身上分割出另一个比我更适宜承担同他的友谊的人来。”事实上，他在这个星期天上午写的这封长信中，已经把他订婚的事告诉了他的朋友，信里这样写道：“我把最好的消息留到最后才写。我已经和一位名叫弗利达·勃兰登菲尔德的小姐订婚了，她出身富家……我知道，以往你由于种种原因而不能来看我们，难道我的婚礼不正是一次可以扫除一切障碍的极好的机会吗？但是，不管怎样，你还是不要考虑太多，而只是按照你自己的愿望去做吧。”格奥尔格手里拿着这封信在书桌前坐了很久……他终于把信放入口袋，走出房间，穿过狭小的过道来到对面他父亲的房间里。（《判》：46）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些文字，我们不妨先看看前面那一片段：“他常常和未婚妻谈起这位朋友，以及他们在通信中这种特殊的情形。‘那么他不会来参加我们的婚礼了，’她说……”在该段首句中，“常常”这一副词表明此处的叙述模式是总

^① 虽然前文仅涉及在俄国经商的那一位朋友，卡夫卡却选用了复数的“Freunde”来涵盖格奥尔格的其他朋友。这在情节发展里无关紧要，甚至显得不合逻辑，但在隐性进程里却十分重要，因为卡夫卡想要表达的是格奥尔格的朋友们所体现的社会压力。

结概述，然而，从第二句开始，又突然转为直接引语这种场景展示模式。通常，总结概述和场景展示是互为对照、互不相容的叙述模式，然而卡夫卡却巧妙自然地把两者融合为一体，用一个“场景”来“概述”常常发生的事：格奥尔格与未婚妻关于这位朋友的一次对话，代表了他们的多次对话。毫无疑问，未婚妻对社会评价的担忧，不止一次引起了格奥尔格的类似忧虑。然而，在此之前，他更加关注的是朋友的自尊和困境。而“这时”，他对社会评价的担忧终于占了上风，不再顾忌贫穷潦倒的朋友的感受：他决定告诉朋友自己订了婚，对象是一位“富家”小姐。卡夫卡还通过格奥尔格的“自言自语”，直接展示出他为了社会评价而不惜牺牲友情：“我无法从我身上分割出另一个比我更适宜承担同他的友谊的人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社会压力对个体的扭曲：一个十分看重朋友、一心为其考虑的男人，在社会目光的压力下，可以不顾朋友的感受，甚至不惜牺牲他们之间的长期友谊。^① 格奥尔格之所以告诉朋友自己订了婚，是为了邀请和劝说他来参加婚礼，以便为自己和未婚妻赢得更好的社会评价，同时为自己在未婚妻面前挽回脸面。当然，他不能过于勉强朋友，因此还是表示尊重朋友的意愿。格奥尔格与未婚妻的短暂互动，展现出他的一大困扰：明知告诉朋友自己订婚并邀请他参加婚礼，对方会受到伤害，但又迫于社会压力最后不得不这么做。

综上所述，就格奥尔格关于朋友的长篇思考而言，在隐性进程里，我们看到的不是父子冲突，也不是格奥尔格和朋友（或其自身的另一个自我）之间的差异，而是他和朋友面对社会压力时的本质相通：两人都极其在乎社会评价，都受到社会的挤压和扭曲。在这股叙事暗流里，我们关注的是与父子冲突处于不同运行轨道的个人与社会的冲突：一个人是否能回国发展，取决于能否在朋友面前抬得起头；是否具有结婚资格，取决于朋友能否参加婚礼；是否能维持和朋友的友情，也受制于社会的看法。也就是说，个人的事业和生活均受制于社会压力，取决于社会评价。从这一角度，我们不难理解为何那位事业不顺的朋友“准备独身一辈子”——可以借此躲避妻子带来的社会压力。

二、父子互动部分的双重叙事运动

格奥尔格写完信后，“手里拿着这封信在书桌前坐了很久”，显然感到十分

^① 那位朋友非常珍视跟格奥尔格的友情，曾邀请格奥尔格移居俄国发展，但他为格奥尔格预测的前景与格奥尔格现在的成功相比，“简直微不足道”（《判》：45），因此不会给他带来太大压力。

负疚和不安。在这种心态下，他拿着信去找住在过道另一头的父亲。

他已经有好几个月没有来过父亲的房间了。事实上，他也没有必要到他父亲的房间里去，因为他在商行里经常同父亲见面，他们又同时在一个餐厅用午餐，晚上虽然各干各的，可是除非格奥尔格出去会朋友——这倒是常事，或者如现在这样去看望未婚妻，他们总要在共同的起居室里坐上一会儿，各人看自己的报纸。（《判》：46。着重号和下划线为引者所加）

这是全知叙述者从自己的角度进行的描述。对于聚焦于父子冲突的情节发展而言，用下划线标记的文字十分重要，体现出父子之间缺乏交流（详见《卡》：201；see also “Tradition”：92 - 93）。而在情节背后的隐性进程里，重要的则是用着重号标记的文字，间接表达出格奥尔格在社会压力下所陷入的困境。全知叙述者告诉读者，格奥尔格平时不去父亲的房间，“事实上，他也没有必要到他父亲的房间里去”。三个表示转折的副词“虽然”、“可是”、“总要”，也强调父子有机会在“共同的起居室”会面。然而，这封信却迫使格奥尔格打破惯例：他很可能是想通过告诉父亲这件事并得到父亲的认可，来减轻自己的负疚和不安。

值得注意的是，在《判决》的隐性进程中，社会评价和社会压力是通过周围的人体现的。那位朋友所感受的社会压力，源于跟格奥尔格和其他朋友在事业和生活上的对比，父亲所感受的社会压力则来自跟儿子的对比。我们不妨先看看父亲的这段话：

“是的，我当然是在演滑稽戏！滑稽戏！多好的说法！一个老鳏夫还能有什么别的安慰呢？你说——在你回答问题的这个瞬间，你还是我的活着的儿子——除此之外我还剩下什么呢？我住在背阴的房间里，已经老朽不堪，周围的一批职工又是那样的不忠实。而我的儿子春风得意招摇过市，签订一项又一项其实我早已打点好的生意，趾高气扬，忘乎所以，却还在他父亲面前摆出一副三缄其口的正人君子相！你以为我不曾爱过你这个我亲生的儿子吗？”（《判》：51）

父亲自称“已经老朽不堪”的“老鳏夫”，心里清楚除了“演滑稽戏”，自己一无所有。因为已经由儿子接班，职工对他也不再忠实。如果远走俄国的朋友仅因

为留在国内的朋友事业有成就会承受重压，面对事业方兴日盛的儿子，日渐老朽的父亲所感受的社会压力更是可想而知。

从“在你回答问题的这个瞬间，你还是我的活着的儿子”可以窥见，面对儿子带来的社会压力，父亲甚至希望儿子死去。在谈到俄国的那位朋友时，父亲说：“他要是我的儿子倒合我的心意。”（《判》：50）那位朋友穷困潦倒，孑然一身，不会给父亲带来社会压力，因此得到父亲的喜爱。通常，父亲会希望儿子事业成功，生活幸福，但在《判决》中，社会压力是个人难以承受之重。父亲在社会压力下心理严重变态，不满儿子的成功和订婚，反而希望儿子像那位朋友一样沦入困境。

格奥尔格进入父亲的房间后，感到非常惊讶：

甚至在这个晴朗的上午，他父亲的房间还是那样阴暗。耸立在狭窄庭院另一边的高墙投下了这般的阴影。父亲坐在靠窗的一个角落里，这个角落装饰着格奥尔格亡母的各种各样的纪念物，他正在看报，把报纸举在眼前的一侧，以弥补某种视力缺陷……“这里黑得真受不了。”他〔格奥尔格〕接下去说。“是的，确实是很黑。”父亲回答。“那你还把窗户关着？”“我喜欢这样。”（《判》：47）

在情节发展中，高墙下的“阴影”可以象征父亲的暴君式统治罩住儿子的“强大阴影”^①；就隐性进程而言，儿子的成熟及其事业的蒸蒸日上（人生的阳光时期），则反衬出父亲的老朽衰退（人生的阴暗时期），这种反衬也如高墙在阳光照射中投下阴影。也就是说，同样的词语在两种叙事运动中具有截然不同的象征意义，产生较强的语义密度和文本张力。

格奥尔格的那位朋友因为事业不顺而躲在国外，离群索居，将自己封闭；父亲则因为自己的“老朽不堪”而坐在墙角，大晴天把窗户关上，将自己封闭。格奥尔格告诉父亲：

“我写了一封寄彼得堡的信宣布我订婚的事。”他把信从口袋中抽出一点儿，然后又放了回去。“为什么要写信到彼得堡去？”父亲问。“告诉我在哪儿的朋友。”……“哦，你的朋友。”父亲以特别强调的口吻说道。“父

① 叶廷芳《卡夫卡及其他》，第48页。

亲, 你知道, 我一开始并不想把订婚的事告诉他。这主要是考虑到他的情况, 并不是由于别的原因……他反正决不会从我自己这里知道这件事情。”“这么说你现在已经改变了主意?” 父亲问道……“是的, 现在我已经仔细考虑了。我想, 如果他是我的好朋友, 那么我的幸福的婚约对他讲来也是一件高兴的事。因此我不再犹豫, 一定要把这件事通知他。可是在我发信之前, 我先要把这件事告诉你。”(《判》: 47-48。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如前所述, 格奥尔格明白这封信会给朋友造成伤害。他在跟父亲谈这封信时, 一开始并未提到朋友, 而仅仅提及朋友所在的城市, 拿出信件时也显得十分犹豫, 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这封信给他带来的负疚和不安。父亲也清楚这封信会给朋友带去的社会压力, 因此以“特别强调”的语气说道: “哦, 你的朋友。”从格奥尔格回答中的“反正决不会从我自己这里知道这件事情”来看, 他曾经以友情为重, 下决心保护朋友的自尊; 然而, 面对未婚妻的不断施压, 他终于写下这封信, 把自己面临的社会压力转移到朋友身上。

跟朋友为不回国找借口一样, 格奥尔格也为写这封信找了借口(从中也可窥见社会压力对个人的一种扭曲: 为了自己的脸面而找借口, 说假话): “我想, 如果他是我的好朋友, 那么我的幸福的婚约对他讲来也是一件高兴的事。”然而, 他此前的自言自语“我无法从我身上分割出另一个比我更适宜承担同他的友谊的人来”则暴露出, 他非常清楚, 这封信不仅会伤害朋友的自尊, 而且会破坏两人的珍贵友情。

儿子几个月来首次来父亲的房间, 商量请教。“老朽不堪”的父亲近来一直感受到儿子给自己带来的沉重社会压力, 而此时终于获得机会来贬斥儿子, 提高自己的社会评价:

“格奥尔格,” 父亲说, 撇了一下牙齿都已脱落了嘴, “听我说! 你是为这件事到我这里来想要同我商量, 这无疑会让你感到荣幸 (Das ehrt dich ohne Zweifel)。但是, 如果你现在不把全部事情的真相告诉我, 这等于什么也没说, 甚至比不说更令人恼火……我已经精力不济了, 记忆力也在逐渐衰退……但是既然我们正在谈论这件事, 谈论这封信, 我求你, 格奥尔格, 不要欺骗我。这是一件小事情, 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的, 所以你千万不要欺骗我。难道你在彼得堡真有这样一个朋友?” (《判》: 48)

值得一提的是，德语的“ehren”（ehrt 的原形）有“使…感到荣幸，感到自豪”的意思。^① 笔者借鉴的中译本将“Das ehrt dich ohne Zweifel”翻译成“毫无疑问你这样做是值得赞许的”，而两个英译本则分别译为“No doubt that does you honor”（毫无疑问这为你增光）^② 和“That does you credit, no doubt”（这绝对是给你增光）^③。中译本的选择从情节发展来看没有问题，语流也更加顺畅。但从隐性进程考虑，“让你感到荣幸”或“给你增光”这样的翻译才能达意。^④ 在家庭内部，儿子跟父亲商量一封写给朋友的信，实在谈不上会让儿子感到荣幸或给儿子增光，父亲这种不合情理的评价实际上反映出他急于通过抬高自己、贬低儿子来减轻社会压力的病态心理。

在上引片段中，父亲首先用命令式的“听我说！”把自己摆到了居高临下的位置，接着又用“这无疑会让你感到荣幸”，来加强这种我高你低的对比。随后父亲以自己“记忆力也在逐渐衰退”为铺垫，以“我求你”为幌子，出人意料地抛出一句：“你千万不要欺骗我。难道你在彼得堡真有这样一个朋友？”在阐释情节发展时，关于父亲的这句问话，批评家们看法不一。有学者认为父亲的问话跟事实相冲突，是其神志错乱的体现^⑤；有学者认为父亲是在质疑格奥尔格与那位通信者是否真的是朋友^⑥；也有学者认为父亲的问话质疑了格奥尔格心里想着的这位朋友究竟是否存在（see “Georg”：98）。在情节背后的隐性进程里，我们看到的则是，父亲在社会压力下的心理变态：神志健全的他有意上演“滑稽戏”，明知儿子说的是真话，却要攻击儿子说假话；明知儿子有这位朋友^⑦，却要问儿子究竟是否有这位朋友，藉此打击儿子的自尊和自信，减轻自己在儿子身上感受到的社会压力。父亲的问话令格奥尔格“非常困惑”（《判》：48），他答道：

“别去管我的朋友了，一千个朋友也抵不上我的父亲。你知道，我是怎

① 详见张才尧等编《新编德汉词典》，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4年，第373页。

② Willa Muir and Edwin Muir, trans., “The Judgment”, in *Selected Short Stories of Franz Kafka*, New York: The Modern Library, 1993, pp. 10–11.

③ Malcolm Pasley, trans., “The Judgment”, in Angel Flores, ed., *The Problem of “The Judgment”: Eleven Approaches to Kafka’s Story*, p. 6.

④ 也可翻译成“你这样做无疑很得体”。

⑤ See Claude-Edmonde Magny, “The Objective Depiction of Absurdity”, in Angel Flores, ed., *The Kafka Problem*, New York: Gordian Press, 1976, pp. 81–87.

⑥ See Heinz Politzer, *F. K.: Parable and Paradox*,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2, p. 57.

⑦ 父亲的第一反应“哦，告诉你的朋友了？”和后面的多处断言如“我当然认识你的朋友……”（《判》：50），都确认了朋友的存在。

样想的？你太不注意保重你自己了，年岁可不饶人。商行里的事没有你是不行的，这你知道得很清楚，但是如果因为做生意而损坏了你的健康，那么我明天就把它永远关门。这样可不行，我们必须改变一下你的生活方式，并且要彻底改变……”（《判》：48）

可以看出，格奥尔格是一个有很强负疚感的人。给朋友的信令他如此负疚才来找父亲，而父亲令他困惑不解的问话，又让他担忧年迈父亲的健康，觉得自己不应再打搅他。父亲是他最为看重的人，为了父亲的身体，他希望父亲不要再管商行，要彻底改变生活方式。同时为了安抚自尊心极强的父亲，他不惜贬低自己，抬高父亲：“商行里的事没有你是不行的。”（请比较前文中他的自言自语）接下来，他提出和父亲对调房间，让父亲享受阳光和明亮。^① 他以为父亲真的忘了这位朋友，于是提起朋友从前来访时跟父亲交流的情况，特别是朋友跟他们说起的“关于俄国革命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判》：49），以此来刺激父亲的思维，帮助他恢复记忆。他替父亲脱掉衣服，服侍他上床休息：

说话中间格奥尔格已经扶他父亲坐下，并且小心地替他脱掉穿在亚麻布衬裤外面的针织卫生裤，又脱掉了袜子。当看到父亲的不太清洁的内衣时，他责怪自己，对父亲照顾不够。经常替父亲更换洁净的内衣，这是他应尽的责任。他还没有开口同未婚妻商量过，将来他们准备怎样安置父亲。因为他们俩都有个心照不宣的想法，父亲会独自留在老宅子里的。可是他现在迅速而明确地决定，要把父亲接进未来的新居。如果仔细考虑一下，搬进新居后再去照顾父亲，看来可能为时已经太晚了。他把父亲抱到床上，当他向床前走这几步路的同时，他注意到父亲正在他怀里玩弄他的表链，于是产生了一种惊恐的感觉。他一时无从把父亲放到床上，因为父亲紧紧地抓住表链不放。（《判》：50。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通过选用着重号标示的词语直接展示格奥尔格的内心想法，卡夫卡让我们看到，这是一个责任感和负疚感很强、对父亲相当孝顺的儿子。作品也通过三方面的描述突出了父亲的“老朽不堪”：一是儿子认为“搬进新居后再去照顾父亲，看来

^① 父亲（和母亲）一直住在这个背阴的房间。很可能是出于对亲生儿子的爱（“你以为我不曾爱过你这个我亲生的儿子吗？”），父母把朝阳的房间让给儿子住。

可能为时已经太晚了”，暗示儿子担心父亲病倒，甚或活不长久；二是“牙齿都已脱落”、“白发蓬乱”（《判》：49）的父亲在儿子“怀里玩弄”表链，并“紧紧地抓住表链不放”这种孩童般的行为；三是格奥尔格看到曾经独断威严、身材依然魁梧的父亲这种孩童般的行为时，所产生的“一种惊恐的感觉”。儿子一心为父亲的健康考虑，希望尽力照顾好年迈力衰的父亲。而父亲却在社会压力下心理变态，不断贬斥儿子，导致其投河自尽。

当儿子问父亲是否想起了朋友时，心里清楚自己在演“滑稽戏”的父亲转换话题，反问儿子：“我现在已经盖严实了吗？”（Am I well covered up now?^①）当儿子帮他掖好被，回答说已经盖严实了时，父亲却抓住这个机会来抬高自己，打击儿子。他掀开被子，直立在床上，用一只手“轻巧地撑在天花板上”，显得顶天立地，然后对儿子说：

“你要把我盖上（You wanted to cover me up），这我知道，我的好小子，不过我可还没有被完全盖上。即使这只是最后一点力气，但对付你是绰绰有余的。我当然认识你的朋友。他要是我的儿子倒合我的心意。因此这些年来你一直在欺骗他。难道不是这样吗？你以为我没有为他哭泣过吗？因此你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经理有事，不得打扰——就是为了你可以往俄国写那些说谎的信件。但是幸亏父亲用不着别人教他，就可以看透儿子的为人。现在你认为，你已经把他征服了，可以一屁股坐在他的身上，而他则无法动弹，因为我的儿子大人已经决定结婚了！”格奥尔格抬头望着他父亲这一副骇人的模样。父亲突然之间如此了解这位身居彼得堡的朋友，而这位朋友的景况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打动过格奥尔格，他看见他落魄在辽阔的俄罗斯，他看见他站在被抢劫一空的商店门前，他正站在破损的货架、捣碎的货品和坍塌的煤气管中间。他为什么非要到那么遥远的地方去呢？（《判》：50）

不少批评家从“cover up”一词读出了“埋葬”的意思，认为儿子在跟父亲的竞争中，想“埋葬”或“除掉”父亲（详见《卡》：201；see also “Georg”：106）。^②而不少从俄狄浦斯情结角度切入的批评家则认为，该词象征着儿子取代父

① Willa Muir and Edwin Muir, trans., “The Judgment”, p. 14; 下面括号中的英文均出自同一页。

② 详见凯特·费洛里斯《〈判决〉》，李自修译，收入叶廷芳编《论卡夫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138-139页。

亲成为一家之主和商行老板。^①从这些角度来看,父亲对儿子的指控合乎情理。然而,前文已经明确无误地告诉读者“老人自己盖上被子。还把被子盖过了肩膀”(He covered himself up and even drew the blankets farther than usual over his shoulders)(《判》:50)。父亲自己做了件事(covered himself up),却就此事无理取闹,诬赖儿子,这充分体现出他在社会压力下的心理变态。他把事业有成的儿子看成社会压力的化身,把他当成敌人来“对付”,无中生有地加以诋毁。与此同时,父亲却与身在俄罗斯的那位儿子的朋友同病相怜,与其说他是为那位朋友的境遇哭泣,倒不如说他是联想到自己类似的境遇而感到自怜。他明知儿子不告诉那位朋友自己订婚,是为了保护那位朋友,却要攻击儿子说谎骗人。出于病态心理,他把儿子的订婚描述成压迫那位朋友的行为。卡夫卡则通过直接展示儿子的内心世界,让我们看到儿子对朋友的深切关怀和满心担忧,这有力反驳了父亲的指控。接下来父亲攻击儿子受到未婚妻的诱惑而与其订婚:

“因为她这样地、这样地、这样地撩起了裙子,你就和她接近,就这样你毫无妨碍地在她身上得到了满足,你亵渎了我们对你母亲的怀念,你出卖了朋友,你把父亲按倒在床上,不叫他动弹。可是他到底能动还是不能动呢?”说完他放下撑着天花板的手站着,两只脚还踢来踢去。他由于自己能洞察一切而面露喜色。格奥尔格站在一个角落里,尽可能地离他父亲远一点。长久以来他就已下定决心,要非常仔细地观察一切,以免被任何一个从后面来的或从上面来的间接打击而弄得惊慌失措。现在他又记起了这个早就忘记了的决定,随后他又忘记了它,就像一个人把一根很短的线穿过一个针眼似的。“但是你的朋友毕竟没有被你出卖!”他的父亲喊道,一面摆动食指以加强语气,“我是他在这里的代表。”“你真是滑稽演员!”格奥尔格忍不住也喊了起来,但立刻认识到他闯下了祸,并咬住舌头,不过已经太晚了,他两眼发直,由于咬疼了舌头而弯下身来。(《判》:51)

无论是活在世上还是亡灵在天,母亲都会盼望早已成年的儿子结婚成家。然而,在社会压力下心理变态的父亲却指控儿子订婚是对亡母的亵渎,还无中生有地指控儿子限制自己的自由。这些都使“洞察一切”这一词语带上了较强的反讽色彩。

^① See Kenneth Hughes, “A Psychoanalytic Approach to ‘The Judgment’”, in Richard T. Gray, ed., *Approaches to Teaching Kafka's Short Fiction*, p. 87.

一个年迈体衰的老人，突然掀开被子，直立在床上，“两只脚还踢来踢去”，上演“滑稽戏”，令人觉得十分荒唐可笑。但老人这样做，是为了减轻自己在儿子身上感受到的社会压力，这又令人觉得十分可悲。社会压力逼迫朋友留在“那么遥远的地方”，也象征性地逼迫父亲待在门窗紧闭的房间一角。而此时，父亲对儿子施加的社会压力（指责儿子背叛母亲，出卖朋友，迫害父亲），又把儿子逼到了“角落里”。从“一切”和“任何一个”这些宽泛的指涉语可以看出，格奥尔格“长久以来”下决心躲避的，是两个层次的打击。在情节发展这一层次，他躲避的是暴君式父亲的打击。而在情节背后的隐性进程里，他躲避的则是来自整个外部世界的打击。我们可以从中窥见个体在社会压力之下的异化，为防备外来打击而提心吊胆。格奥尔格接管公司之后，飞黄腾达，社会压力大大减轻，所以“忘记了”自己的决定。父亲的无端指控使他想起了自己的决定，但又马上忘记了，这种忘性为他对父亲的无端指控信以为真作出铺垫。

父亲不仅无端攻击儿子，还声称自己是那位朋友的代表，这让格奥尔格忍不住大声反驳，但马上极其后悔。从情节发展来看，格奥尔格这么后悔，是因为冒犯了暴君式父亲的家长权威；而就隐性进程而言，则是因为这给了父亲负面的社会评价，格奥尔格深知其后果之严重。父亲跟儿子展开争斗：

“你别搞错了！我还是要比你强得多。如果单靠我一个人也许我不得不退缩，但是你的母亲把她的力量给了我，我和你的朋友关系好得很，你的顾客的名单也都在我的口袋里呢！”“他甚至连衬衣也有口袋！”格奥尔格寻思道，并且相信，他如果把这些谈话公之于世，就会使父亲不再受人尊敬。他也只是在一刹那间想到这些，因为他不断地又把一切都忘记了……“今天你真使我非常快活，你跑来问我，要不要把你订婚的消息写信告诉你的朋友。他什么都知道了，你这个傻小子，他什么都知道了！我一直在给他写信，因为你忘了拿走我的笔。因此他这几年就一直没有来我们这里，他什么都知道，比你自已还清楚一百倍呢，他左手拿着你的信，连读也不读就揉成了一团，右手则拿着我的信，读了又读！”他兴奋得把手臂举过头顶来回挥动。“他什么都知道，比你清楚一千倍！”他喊道。“一万倍！”格奥尔格说这话本来是想嘲笑他父亲的，但是这话在他嘴里还没说出来时就变了语调，变得非常严肃认真。（《判》：52）

在情节背后的隐性进程中，父亲和儿子都在跟社会压力抗争。年迈体衰的父亲把儿子视为社会压力的化身，力求通过与亡妻、儿子的朋友和顾客结盟，来压倒儿子。这种结盟的基础是谎言：母亲已经去世，无法给父亲力量，且不会与儿子为敌。在格奥尔格思考与朋友的关系时，曾这样想：“对这种不幸事件〔自己失去母亲〕的悲痛是身居异国的人所完全无法想象的。”（《判》：44）表面上看，这仅涉及朋友的情感变化，而在更深的层次，也在为此处暗暗揭示父亲的谎言作铺垫。从“完全无法想象”可以推断，格奥尔格对母亲的逝世十分悲痛，母子之间感情至深。我们在格奥尔格的思考中也可看到，朋友认真阅读他的信，并予以回应，对他信中提到的事情“发生了兴趣”（《判》：45），这暗暗驳斥了父亲“他左手拿着你的信，连读也不读就揉成了一团”的描述。父亲声称自己跟儿子的顾客也有密切联系（“你的顾客的名单也都在我的口袋里”）。儿子的反应（“他甚至连衬衣也有口袋！”）则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实际上衬衣没有口袋，因此父亲的话是谎言；二是儿子极其在意社会评价，相信如果把父亲的话语公之于众，“就会使父亲不再受人尊敬”。但格奥尔格仅仅保持了“一刹那”的清醒，他“不断地又把一切都忘记了”。这是全知叙述者的字面描述，与前面的比喻性表达相呼应（“随后他又忘记了它，就像一个人把一根很短的线穿过一个针眼似的”），突出了此时格奥尔格的健忘。这种忘性使格奥尔格越来越难以判断什么是父亲的无中生有。当父亲喊出“一千倍！”时，他想用“一万倍！”来嘲笑父亲，但他语气的突转告诉我们他瞬间就忘记了父亲在说谎，把父亲的话当了真。父亲接着说：

“这些年来我一直注意着，等你来问这个问题！你以为，我关心的是其他的事吗？你以为，我在看报纸吗？你瞧！”说着，他扔给格奥尔格一张报纸，这张报纸是他随便带上床的。这是一张旧报，它的名字格奥尔格是完全不知道的。“你成熟之前，犹豫的时间可真不短啊！先得等你母亲死了，不让她经历你的大喜日子；你的朋友在俄国快要完了，早在三年以前他就已经十分潦倒；至于我呢，也到了你现在眼见的这副样子。你不是有眼无珠，我是怎么个状况你是看得见的嘛！”“这样说你一直在等着打击我！”格奥尔格喊道。他父亲替他遗憾地随口说道：“你可能早就想说这句话了。现在这么说不就完全不合适了。”接着，他又提高嗓门说：“现在你才明白，除了你以外世界上还有什么，直到如今你只知道你自己！你本来是一个无辜的孩

子，可是说到底，你是一个魔鬼般的人！——所以你听着，我现在判你去投河淹死！”（《判》：52-53）

如前所引，格奥尔格进父亲房间的时候，父亲“坐在靠窗的一个角落里，这个角落装饰着格奥尔格亡母的各种各样的纪念物，他正在看报”。母亲在世时，父亲掌控一切，享有较高社会声誉。母亲去世后，儿子接管公司，父亲不仅失去掌控，而且日渐衰老，在与儿子的对比中，社会压力日渐增大。为了减轻压力，父亲一方面逃避现实，躲进布满母亲纪念物的角落，阅读昔日的报纸，沉湎在对过去的怀念中；一方面则等待机会打击儿子：

自从你亲爱的母亲去世后，已经出现了好几起很不得体的事情。也许谈这些事情的时候到了，也许比我们想象的要来得早一些……今天你真使我非常快活，你跑来问我，要不要把你订婚的消息写信告诉你的朋友……这些年来我一直注意着，等你来问这个问题！你以为，我关心的是其他的事吗？（《判》：48-52）

父亲在社会压力下严重异化和变态，一心想着如何通过打击儿子，来减轻自己的压力——这成了这些年他唯一关心的事情，今天好不容易等来机会，因此“非常快活”。值得注意的是，父亲对社会压力极为敏感，在他眼里，儿子“在他父亲面前摆出一副三缄其口的正人君子相”，而我们看到的实际情况则是：儿子为了那封给朋友的信，来征求父亲的意见；他“既善良又恭顺尽责”^①，进入父亲的房间后，十分关心体贴父亲；当父亲叫他的名字时，他“立刻在父亲身旁跪了下来”（《判》：49）；当他忍不住顶了父亲一句嘴时，马上极端后悔，“由于咬疼了舌头而弯下身来”（《判》：49）。

父亲的指控“直到如今你只知道你自己！”直接关涉前面那句：“至于我呢，也到了你现在眼见的这副样子。你不是有眼无珠，我是怎么个状况你是看得见的嘛！”儿子身体健壮、事业发达、订下婚约，这些通常让父亲引以为自豪的东西，在这个社会压力使个体异化和变态的虚构世界里，都成了社会压力的载体，使衰老丧妻的父亲难以承受，因此成为父亲眼里的罪过，甚至让儿子变成“魔鬼般的人”。

① Max Brod, *Franz Kafka: A Biography*, Boston: Da Capo Press, 1995, pp. 128-129.

就父子互动部分而言,在情节发展中,我们看到的是两人之间的冲突。我们或者把善良孝顺的儿子看成父亲暴君式统治的牺牲品,或者认为自我中心的儿子罪有应得。在情节背后的隐性进程里,我们看到的则是个体与社会的关系,父亲在社会压力下残忍赐死自己的亲生儿子;儿子也无意中成为社会压力的化身,成为父亲的难以承受之重。父子两人都是社会压力的牺牲品。

三、结尾部分的隐性进程

下面这两段构成作品的结尾:

格奥尔格觉得自己被赶出了房间,父亲在他身后“砰”的一声倒在床上的声音还一直在他耳中回响。他急忙冲下楼梯,仿佛是滑过一片倾斜的平面。他出其不意地撞上了正走上楼来预备收拾房间的女佣人。“天哪!”(Jesus!)女佣人喊道,并用围裙遮住自己的脸,可是,格奥尔格已经走远了。他快步跃出大门,被驱使着穿过马路,向河边跑去。他已经像饿极了的人抓住食物一样紧紧地抓住了桥上的栏杆。他悬空吊着,就像一个优秀的体操运动员。在他年轻的时候,他父母曾因他有此特长而引为自豪。他那双越来越无力的手还抓着栏杆不放,他从栏杆中间看到驶来了一辆公共汽车。它的噪声可以很容易盖过他落水的声音。于是,他低声喊道:“亲爱的父母亲,我可一直是爱着你们的。”说完他就松手让自己落下水去。

这时候,正好有一长串车辆从桥上驶过。(《判》:53)

在作品前面部分,我们看到的是,“在最美好的春季里”(《判》:43),掌管公司、“鸿运高照”(《判》:45)的格奥尔格享受着较高社会声誉,居高临下地考虑着身处异国的那位朋友;享受着国内的朋友圈子(“除非格奥尔格出去会朋友——这倒是常事”);为自己事业上的成功而洋洋自得;已经和富家小姐订婚;母亲过世后和父亲一起生活。然而,父亲的贬斥完全打碎了 this 画面。如前所引,全知叙述者通过字面和比喻性表达的相互呼应、相互加强,强调了格奥尔格此时的健忘。这种健忘使格奥尔格对父亲的无端攻击和一派谎言信以为真:身处异国的朋友因为被他“欺骗”和“出卖”而鄙视他,连他的信都不屑一顾,而这位朋友是其他朋友的代表(“既然你有这样一些朋友”);母亲“把她的力量给

了”父亲，联手来“对付”他；顾客也跟父亲站在一起。格奥尔格颇为自豪的商业成功是因为父亲“早已打点好”；他引以为荣的跟富家小姐的订婚，则是为自己缺乏道德，经不起诱惑，也是对母亲的“亵渎”。父亲是母亲、朋友和顾客的“代表”——整个社会和整个外部世界的代表。未婚妻会离他而去（“挽着你的未婚妻走到我的跟前来吧！我会让你还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就将她从你的身边赶走的！”[《判》：52]）；女佣人也排斥他（“用围裙遮住自己的脸”）。

在情节发展里，我们为格奥尔格真的去自杀感到“诧异”和“困惑难解”^①；但在隐性进程里，这却毫不费解——他遭到了整个社会的贬斥和抛弃。在这个虚构世界里，社会压力是个人难以承受之重（格奥尔格死到临头还在考虑自己的脸面——“它的噪声可以很容易盖过他落水的声音”），他除了自杀别无他路。“格奥尔格觉得自己被赶出了房间……被驱使着穿过马路”暗示他受到社会压力的驱赶，而父亲也在社会压力的作用下，充当了儿子的刽子手。儿子的死是社会压力扭曲父子两人的结果，象征的是社会压力对两代人乃至所有个体的迫害。

在作品结尾，我们不仅在明处看到儿子的自杀，而且在暗处看到父亲的悲惨结局。当父亲直立在床上演滑稽戏时，格奥尔格心想：“要是他倒下来摔坏了怎么办？”（《判》：51）这一担心此时成为现实：“父亲在他身后‘砰’的一声倒在床上的声音还一直在他耳中回响。”在隐性进程里，这句话大大加强了悲剧效果。儿子一心想照顾好父亲（“一直在他耳中回响”暗示他十分挂念父亲），但现在明知父亲摔坏了，却只能置之不顾，被社会压力逼着往自绝的道路上冲。可以想见，摔倒在床的父亲会陷入怎样的困境——会比在俄国的落魄朋友甚或自杀的儿子更加悲惨。格奥尔格的未婚妻遭父亲排斥，在格奥尔格死后应不会造访。丧妻丧儿、“老朽不堪”的父亲摔坏之后，只能在病痛的折磨中孤独地死去。如果仅仅看情节发展，我们可以看到暴君式的父亲象征着奥匈帝国统治者的暴政^②、专横过时的社会秩序^③或者父权制的家长权威^④，但却难以看到，在社会压力下，貌似强权的父亲其实是跟儿子同样可怜牺牲品。

① 详见罗素·伯曼《卡夫卡的〈判决〉：传统与背叛》，赵山奎译，载《东吴学术》2014年第4期，第106-107页；see also Elizabeth W. Trahan, "Georg Bendemann's Path to the Judgment", in Richard T. Gray, ed., *Approaches to Teaching Kafka's Short Fiction*, p. 94.

② 详见叶廷芳《卡夫卡及其他》，第142页。

③ See Carolin Duttlinger, *The Cambridge Introduction to Franz Kafk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29.

④ See David Pan, "The Persistence of Patriarchy in Franz Kafka's 'Judgment'", in *Orbis Litterarum*, 55 (2000), pp. 135-160.

结尾也通过儿子的体操特长，突出了过去和现在的对照，过去儿子的优秀是父亲的骄傲，因为那不会带来社会压力；而现在儿子的成功则成为父亲眼中的死罪，因为社会压力使父亲严重变态。格奥尔格低声喊出的遗言“亲爱的父母亲，我可一直是爱着你们的”，有力地增强了作品的悲剧性。这是在生命的最后关头，在四周无人的情况下，格奥尔格由衷的、绝望的呼声。^① 这是一个本来可以让父亲晚年幸福的孝子，而心理变态的父亲却扼杀了正当年的儿子，同时把自己送上了绝路。

作品的最后一句“这时候，正好有一长串车辆从桥上驶过”构成一个独立段落，在读者的阅读心理中占据突出位置。就情节发展而言，可以说，车流“意味着来来往往，交流、沟通，而这正是格奥尔格所缺乏的”（《卡》：203）。然而，在情节背后的隐性进程里，格奥尔格的落水和车流驶过之间的对比，则具有十分不同的含义。“这时候”和“正好”所突出的两者之间的反差，暗暗强化了个人（被逼自杀）与社会（照常运转）之间的对照。对于个体悲剧，社会（“公共汽车”、“一长串车辆”）显得十分冷漠，毫不关心。

四、情节发展与隐性进程

一个世纪以来，中外批评家从各种角度对《判决》的情节进行了解读，挖掘出多种深层意义，大大拓展和丰富了我们对此一作品的理解。然而，如果仅考察情节发展这一种叙事运动，我们的视野难免会受到限制。前文提到的约翰·怀特探讨了格奥尔格的自我中心与格奥尔格对自身某方面的背叛在作品中的“交织”，看到“父亲、朋友和格奥尔格代表了同一个人的不同方面”，认为这三个主要人物的“象征性对应”既突出表达了格奥尔格的自我中心，也更加生动地展示出格奥尔格对自己的背叛（see “Georg”：112）。怀特和其他不少中外批评家的论述不乏辩证眼光、敏锐洞察和深入思考，令笔者十分钦佩，但因为仅仅关注了情节发展，因此也囿于对人物性格和人物关系的解读。有学者提出了这样的质疑：“既然[格奥尔格的]朋友回国定居‘不会有什么障碍’，那么回国怎么又是‘根本不可能办到的’呢？”（《卡》：198）在情节发展中，我们仅能看到格奥尔格与朋友的冲突：“真正阻止朋友回国的障碍不在别人，而在格奥尔格自己……他不希望有一个潜在的竞争对手生活在自己的眼皮底下。”这一解读意在

^① 格奥尔格对父亲始终不渝的爱令人联想起卡夫卡《变形记》里变成大甲虫的主人公对冷漠的家人恒久不变的爱，两位主人公都被自己一直深爱的家人和社会抛弃，在孤独中绝望地死去。

为阐释父子两人之间的冲突作出铺垫：“格奥尔格所做的一切在于降低父亲的地位，使他不再成为自己的威胁，这就像他对朋友的怜悯一样，其目的在于肯定自己目前的生活和地位，不希望发生什么变化。”（详见《卡》：198-200）至于格奥尔格在邀请朋友参加自己的婚礼这件事上表现出的犹豫不决，有批评家认为这显示出格奥尔格对朋友缺乏诚意和情谊（see “Tradition”：93）。我们只有把注意力拓展到情节背后的另一种叙事运动，才有可能超出个人与个人的关系，看到个人与社会的冲突。

有不少学者从精神分析角度切入对《判决》中父子关系的研究，或认为父亲是儿子的“心理投射”，父亲的行为是儿子内心梦幻的外化^①；或倾向于从俄狄浦斯情结的角度来看父子冲突。^②然而，无论这些批评家如何洞察敏锐，也仅能看到个体的心理特征和家庭内部的关系，而无法看到个人与社会的冲突。

如果仅仅关注情节发展这一种叙事运动，即便我们有意超出父子冲突，也仍然只能看到单个人物的塑造和人物之间的冲突。在阐释《判决》时，任卫东首先承认父子冲突是情节的主要冲突，然后指出：“作品中还有卡夫卡本人没有看到的关系，而这正是文学评论者的任务。”（《个》：41）任卫东“尝试从社会化角度分析格奥尔格在社会化过程中遇到的种种问题，指出他最终失败的原因”（《个》：42）。她这样来看情节的总体冲突：“母亲和代表恋母的朋友、父亲，是格奥尔格社会化过程中必须消除的三个障碍。格奥尔格通过生意的成功和订婚，自认为已经消除了前两者，并且增强了自己的力量，于是，他准备扫除最后一个障碍。”（《个》：43）这样，我们又回到了父子冲突。

有的西方批评家也意识到仅关注父子冲突的局限性。罗纳德·格雷认为理解这个故事所需要的大量传记信息限制了其价值，因此得出结论：《判决》“只是理解卡夫卡作品的一个入口，而其自身还算不上是杰出成就”^③。罗素·伯曼挑战了这一评价，力图捍卫《判决》的文学价值，他把视野拓展到文学创作、文学惯例和文化氛围，认为人物处于“自恋”的文化氛围中，“在此种文化中对自我的兴趣与背叛相联系：格奥尔格背叛了朋友和对母亲的记忆，也抛弃了自己的父亲。但首要的是，这种文化是由一种退化堕落的写作模式标示出来的——卡夫

① See Walter H. Sokel, “Kafka and Modernism”, pp. 24-25.

② See Kenneth Hughes, “A Psychoanalytic Approach to ‘The Judgment’”, pp. 86-93. 该文总结了其他从俄狄浦斯角度切入的批评家的看法。

③ Ronald Gray, “Through Dream to Self-Awareness”, in Angel Flores, ed., *The Problem of “The Judgment”: Eleven Approaches to Kafka’s Story*, p. 72.

卡通过这个文本突破了自我,走向了成熟,而这个文本恰是关于写作的”^①。

从这些解读可以窥见,如果不打破亚里士多德以来批评传统的束缚,把视野拓展到情节发展背后的隐性叙事进程,无论我们怎么努力,都难以看到《判决》中隐藏在父子冲突背后的个人与社会的冲突。

在评论笔者挖掘情节背后“隐性进程”的阐释模式时,H.波特·阿博特指出,笔者的方法所“揭示的意义之所以被读者错过,不是因为意义过于隐蔽,而主要是因为读者的阐释框架不允许他们发现其实就在眼前的意义”^②。阿博特所提到的“读者”并非普通读者,而是撰文著书的西方专家学者,其中不乏造诣精深的批评家。受亚里士多德以来批评传统的影响,他们均聚焦于情节发展,从各种角度阐释其深层意义,而没有关注与情节并列前行的隐性叙事进程。对于在隐性进程中至关重要而在情节发展中无足轻重的文本成分,他们常常视而不见,或者往情节发展上生拉硬扯。如果能把视野拓展到情节发展背后的隐性叙事进程,我们就能发现文学阐释的新天地,就能看到“作品更加复杂深刻和更为广阔的意义世界”^③。

结 语

一个多世纪以来,《判决》“在文学原野上赫然耸立”^④,引起广泛关注。这是一个“极其令人困惑的故事”,“布满了难以解决的问题”,卡夫卡自己“试图加以解说,但他的评论只是让作品更加神秘难解。也有可能他自己都没有完全明白自己写了什么”。^⑤这种“神秘难解”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作品中存在双重叙事运动。如果我们仅仅考察两者之一,即情节发展,就很难解释文中很多看上去不合逻辑、有违常理或偏离情节的文本成分。

卡夫卡自己关于《判决》的介绍和评论,均聚焦于父子冲突,而未涉及个人与社会的冲突,这是中外批评界忽略后者的最为重要的原因。我们可以从两个

① 罗素·伯曼《卡夫卡的〈判决〉:传统与背叛》,第112页。

② H·波特·阿博特《阐释艺术的创新和挑战:申丹〈短篇叙事小说的文体与修辞:显性情节后面的隐性进程〉》,惠海峰译,载《外国文学》2015年第1期,第153页。

③ H·波特·阿博特《阐释艺术的创新和挑战:申丹〈短篇叙事小说的文体与修辞:显性情节后面的隐性进程〉》,第152页。

④ 罗素·伯曼《卡夫卡的〈判决〉:传统与背叛》,第105页。

⑤ See Angel Flores, ed., *The Problem of "The Judgment": Eleven Approaches to Kafka's Story, "Foreword"*; 罗素·伯曼《卡夫卡的〈判决〉:传统与背叛》,第105页。

不同角度来看这一问题。一是亚里士多德以来的批评传统一直仅看情节发展这一种叙事运动，因此卡夫卡也仅对此加以关注。二是卡夫卡有意隐瞒自己更深层次的创作意图，不提及情节背后个人与社会的冲突，将之留给读者来发现。我们需要注意，作者在日记、信件和访谈中所涉及的，很可能只是作品某个方面的意思。譬如，在提到《判决》最后一句（“这时候，正好有一长串车辆从桥上驶过”）表达了何意时，卡夫卡说：“在写这句话时，我想到的是一次猛烈的射精。”^①显然，我们不能（完全）以此为据，来理解作品的结尾句。面对作者的评论，我们需要以作品本身为重，通过全面深入细致地考察文本，判断作品是否超出了作者自己的评论。

如果说《判决》是西方现代派文学的代表作，是卡夫卡创作生涯中一个“真正的突破”，为此后创作的《变形记》、《诉讼》等一系列杰作“开了先河”，成为其“缩影”^②，那我们就不能仅仅关注情节中的父子冲突，而必须把视野拓展到隐性进程中个人与社会的冲突。众所周知，西方现代派文学重在从个人的心理感受出发，表现现代西方社会中人的生存困境，演绎现代西方社会对个体的压抑和扭曲。个人与社会的冲突是西方现代派文学普遍关注的冲突，也是《变形记》、《诉讼》等卡夫卡杰作重点描述的冲突。《判决》和《变形记》均创作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1912年，前后相隔不到三个月（see “Tradition”：85）。当时的西方社会矛盾重重，危机四伏，现代工业对人的异化已经凸现，个体在社会压力下普遍感到孤独、压抑和绝望。就卡夫卡本人而言，至少有三种因素导致他特别关注社会压力：一是他的社会身份特殊——生活在布拉格的说德语的犹太人，漂泊于社会边缘；二是他生性懦弱内向，对外部压力十分敏感，正如他在《致父亲》里所说，他因为体格不如父亲，而感到愧对“全世界”，而暴君式的父亲也造成了他“对其他所有人的永无止境的害怕”；三是卡夫卡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他曾在致密伦娜的一封信中发出这样的呼声：“什么时候才能把这颠倒了的世界稍稍矫正过来一些呢？”^③正是从《判决》开始，卡夫卡对压迫和扭曲个体心灵的现代西方社会或者进行隐蔽的抗议，或者发出有力的呐喊。如果说在《变形记》和《诉讼》等作品中，个人与社会的冲突处于明处，凸显出主人公一人的承压和异化，在《判决》中，这一冲突则隐藏在聚焦于父子冲突的情节背后，处于

① Max Brod, *Franz Kafka: A Biography*, p. 129.

② See Angel Flores, “Foreword”; 凯特·费洛里斯《〈判决〉》，第136页。

③ 叶廷芳主编《卡夫卡全集》（第9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487页。

暗处,更为微妙,表达也更有力度。如果能看到《判决》的隐性进程,就能看到不同个体在社会压力下的封闭、变态和异化,看到主次要人物都是社会压力的牺牲品——身患疾病、落魄天涯的朋友为了逃避社会压力而离群索居,有国不能归;格奥尔格长久以来充满孤独感和恐惧感,提心吊胆地躲避来自各方的打击,此时在父亲面前感受到整个社会的贬斥,并因此丧失无辜的生命;父亲则在社会压力下心理变态,把儿子和自己都送上了绝路;格奥尔格的未婚妻因为社会压力逼迫格奥尔格邀请朋友参加婚礼,却无意中导致未婚夫在社会压力下丧命,婚礼也就无从谈起。

在《判决》中,隐性进程与情节发展构成明暗相映、并列前行的双重叙事运动,两者互相偏离、互相排斥又互为补充,在矛盾冲突中联手塑造出多面的人物形象,表达出丰富深刻的主题意义,生产出卓越的艺术价值。我们必须打破亚里士多德以来批评传统的束缚,把眼光拓展到情节背后,着力挖掘这股并行的叙事暗流。如果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作品的社会意义,更加深刻地把握《判决》和《变形记》、《诉讼》之间的本质相通,就能真正看到为何《判决》不愧是杰出的艺术成就,不愧是卡夫卡本人最为欣赏的作品之一,也不愧为理解西方现代派文学和“20世纪文学敏感性”的关键作品。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短篇小说双重叙事运动研究”(15BWW00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申丹,女,1958年生,英国爱丁堡大学英语语言文学博士,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叙事学、文体学。近期发表的论文和论著有“Dual Textual Dynamics and Dual Readerly Dynamics”(in *Style*, vol. 49, 4 [2015])、*Style and Rhetoric of Short Narrative Fiction: Covert Progressions Behind Overt Plots*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14)、“Stylistics and Narratology”(in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Stylistic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4)、“Defending the Validity of Stylistics and Trying to Make it More Helpful to Literary Interpretation”(in *Linguistics and Literary Studies*, Belin and Boston: De Gruyter, 2014)、“Covert Progression behind Plot Development: Katherine Mansfield’s ‘The Fly’”(in *Poetics Today*, vol. 34, 1 – 2 [2013])、“Implied Author, Authorial Audience, and Context: Form and History in Neo-Aristotelian Rhetorical Theory”(in *Narrative*, vol. 21, 2 [2013])等。

责任编辑:舒荪乐